



团体与日常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

徐志民 [韩]孙安石 [日]大里浩秋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十三章

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与《中国留日学生报》（1947—1949）*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对日本人而言，意味着在战争结束的同时，日本将被盟军占领，这也是他们成为战败国国民的开始。可是，对于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来说，日本战败则成为改变以前被日本人歧视的敌国国民而为战胜国国民身份的契机。当时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有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等）移居到日本内地生活或求学的人，也有从伪满洲国或汪伪政权等被日军占领之地赴日生活

* 本章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C）“冷战期中国外交之形成——以人事制度为中心”（研究代表：王雪萍，研究课题/领域号码：17K02042）、科学研究费（青年研究B）“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民间外交与日中人际交流之实证研究”（研究代表：王雪萍，研究课题/领域号码：23730158）、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B）“教育交流与东亚国际关系——中国留学生的派遣与支援”（研究代表：孙安石，研究课题/领域号码：17H02 686）、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B）“关于战后冷战初期日本的华侨社会的实证研究：东亚秩序之重建”（研究代表：陈来幸，研究课题/领域号码：18H00703）、东洋大学井上圆了纪念研究助成“冷战初期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对在日本中国留学生团体的指导体制研究”（研究代表：荒川雪）阶段性成果。本章是王雪萍在其论文「在日中国人メディアが記録した留日学生の思想及び生活面の変化——中国留日同学総会の機関紙『中国留日学生報』（1947—1949）を手がかりに」『東洋大学社会学部紀要』（第57卷第1号、2019年12月）的基础上修改与翻译而成。

或留学的人。这些人原则上都可以被认定为战胜国国民。但是，在日本的台湾人根据国民政府于1946年6月22日公布的《在外台侨国籍处理办法》的规定，没能自动取得战胜国国民的身份。根据此办法，他们必须在1946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民登记，之后才能被正式认定为中华民国国民，发放“华侨临时登记证”。^①

中国大陆和台湾出身的中国留日学生（以下简称“留日学生”），在战后由于中日两国间的汇款停止而不能接受原派遣机构和家属的资金援助。为了继续在日本的学业，从大陆和台湾来的留日学生最初分别在日本各地设立团体，并分别与日本政府以及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进行交涉，以获得继续学习和生活的资金与配给物资。留日学生的此种穷困状况很快就传到国内，甚至蒋介石、何应钦等也闻知此事。国民政府为解决留日学生的救济问题，任命并派遣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刘增华为“GHQ联络员”赶赴日本。1946年1月刘到达日本后，日本各地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华侨、留学生团体的统合活动随之加快。同年4月“中华民国留日华侨总会”（以下简称“华侨总会”）作为全日本大陆与台湾华侨的统一团体正式成立。5月22日，“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以下简称“同学总会”）作为全日本大陆与台湾的留日学生的全国统一团体也得以组建。^② 田中刚的研究指出，同学总会成立的背景中有1946年5月来到日本的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以下简称“驻日代表团”）的指导。^③

① 陳来幸「在日台湾人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国籍選択」華僑華人の事典編集委員会編『華僑華人の事典』丸善出版、2017年、216—217頁。

② 王雪萍：《战后初期“中华民国政府”对留日学生政策解析——游离于救济与召回之间的政策之成败》，载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9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39—71页。

③ 田中剛「終戦後の華僑と日本の華僑政策」華僑華人の事典編集委員会編『華僑華人の事典』、211頁。

一 《中国留日学生报》的资料来源及解说

《中国留日学生报》(以下简称《学生报》)于1947年1月作为同学总会的机关报创刊。为了研究同学总会的活动,笔者从四处搜集到从1947年3月1日发行的第3期至1957年7月1日发行的第116期《学生报》(其中一部分是复印件,也有一部分缺号、缺页的情况)。搜集工作结束后,笔者与当时在东京大学读研究生的田沼彬文一起制作了《中国留日学生报刊登文章目录》,刊登于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近现代中国人留学生的诸面相——以“管理”和“交流”为中心》^①一书。

第一处是Gordon W. Prange Collection。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官网介绍,GHQ民间审阅部队从1945年至1949年10月对在日本国内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等进行了审阅。审阅结束之后保存下来的资料由GHQ参谋二部的文官修史官Gordon W. Prange移交给美国马里兰大学管理。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批资料的整理工作逐步开展,在1978年将其定名为“Gordon W. Prange Collection”,简称“Prange文库”。在Prange文库中所保存的《学生报》只有1947年3月至1949年10月出版发行的部分。

第二处是由已故日本华侨陈立清的遗属捐赠给笔者的华侨相关研究资料而建立的陈立清文库。陈立清是在东京出生的华侨,其在读书期间曾以同学总会执行委员的身份担任机关报《学生报》的主编。之后,他又创办了旅日华侨青年联谊会机关杂志《东风》,并长期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一直致力于促进日本华侨青年学生的团结。1957年以后,他开始供职于东京华侨总会,并长期担任华侨总会机关报《华侨报》的主编。他为2004年出版的《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的编辑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日本华侨史与中国留日学生史研

^① 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近现代中国人留学生の諸相:「管理」と「交流」を中心に』御茶の水書房、2015年。

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陈立清文库中的大部分资料是在编辑《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的过程中搜集来的。2009年陈立清去世后，其收藏的书籍、杂志、报纸等（大部分与留日华侨相关）由其遗属捐赠给笔者，现存笔者的研究室，正在进行整理。陈立清文库所收藏的《学生报》，包含1948—1957年发行的一部分报纸，早期的多为复印件，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也有一些原件。

第三处是同学总会原主席郭平坦所提供的《学生报》复印资料。郭平坦是台湾出生、神户长大的日本华侨，1950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学习，1952—1956年先后担任同学总会委员、副主席、主席等职。他于1956年回国并长期参与中国政府的对日、对台工作。其回国时带回1950—1956年的大部分《学生报》原件，并保存至今。2007年笔者对其进行采访时，曾将其手中包括《学生报》在内的部分资料进行复印。

第四处是由神奈川大学大里浩秋教授提供的《学生报》复印资料。其主要是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学生报》复印件和台北教育大学何义麟教授从东京华侨总会收集来的资料。^①

本章主要利用以上资料，通过1947—1949年《学生报》刊载的文章，分析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及生活方面的变化。《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中曾提到《学生报》一直发行到20世纪60年代。^②可是，在笔者所能确认的报纸中最后一期为1957年7月1日发行的第116期。大里浩秋教授对东京华侨总会原会长汪洋龙进行采访时，汪说1957年5月1日发行的第114期《学生报》是他确认的最后一期。他认为《学生报》的发行应该在当年就停止了，并说明其理由为当时《学生报》的主要负责人陈立清开始负责旅日华侨青年联谊会的机关杂志《东风》的编辑工作，已经没有时间负

① 王雪萍·田沼彬文「『中国留日学生報』記事目録」大里浩秋·孫安石編『近現代中国人留學生の諸相：「管理」と「交流」を中心に』、529—635頁。

② 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日本僑報社，2004年，67頁。

责同学总会的各种工作。^①另外，根据笔者的采访，曾担任同学总会主席的郭平坦也表示，从1952年开始给留日学生发放救济金的中国政府于1957年停止拨款，同学总会的活动当年就陷入停滞。所以，郭平坦认为《学生报》停止发行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费。^②

《学生报》从创刊之时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旬报》，到后来的《中华留日学生报》，再到《中国留日学生报》，曾两度更名。对此，本章为了方便表述，在正文中统称《学生报》，在注释中则标注为当时报纸的正式名称。

关于纪年的标注，创刊之初只使用“民国”，之后又使用过公元纪年，还有一段时间公元与民国纪年并用，后来完全改为公元，其间变化多次。本章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统一使用公元纪年表述。如希望确认其民国纪年，请参照前述《中国留日学生报刊登文章目录》。

利用《学生报》进行研究的成果，有川岛真、何义麟、陈来幸、田远以及笔者的研究等。^③特别是何义麟的著作《战后在日台

① 大里浩秋「一九五〇、六〇年代の中国留日同学会と華僑社会——陳学全さんに聞く」孫安石・大里浩秋編著『中国人留学生と「国家」・「愛国」・「近代」』東方書店、2019年、313—345頁。

② 对同学总会原主席郭平坦的采访，2015年6月，北京。

③ 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劉傑・川島真編『一九四五年度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31—51頁；何义麟《战后在日台湾人之处境与认同——以蔡朝妍先生的经历为中心》，《台湾风物》（台北）第60卷第4期，2010年12月，第161—194页；何義麟「戦後台湾人留学生の活字メディアとその言論の左傾化」大里浩秋編『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ケ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研文出版、2013年、120—168頁；陳来幸「在日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脱日本化——戦後神戸・大阪における華僑社会変容の諸契機」貴志俊彦編著『近代アジアの自画像と他者：地域社会と「外国人」問題』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1年、83—105頁；田遠「博士学位論文 戦後直後における中国人留日学生の境遇と選択：1945—1952——主に『中国留日学生報』を通じて」、2014年3月；王雪萍：《战后初期“中华民国政府”对留日学生政策解析——游离于救济与召回之间的政策之成败》，载《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9辑，第39—71页；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203—232頁。

湾人的处境与认同》，以及田远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后初期中国留学生的境遇与选择（1945—1952）——以〈中国留日学生报〉为主要资料》和其将该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进行了修改而出版的《一九四五年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境遇与选择——由 Prange 文库展现的“国家形象”》等著述，对《学生报》刊载的文章内容、思想倾向变化的论述最为详细。但是，何著主要论述 1945 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在日台湾人的处境以及他们的媒体，其分析对象也基本局限于台湾出身的留日学生的言论。田远的研究则是将《学生报》作为主要资料，分析从战后一直到 1952 年留日学生的言论、生活情况，甚至对其与驻日代表团的关系等都进行了详尽说明。但是，田远与何义麟的研究都只利用了《学生报》的一部分，并没有对《学生报》报道的整体内容进行综合分析。^①

对此，本章通过对 1947—1949 年的《学生报》中刊载的全部文章的属性、思想倾向进行分类，尝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通过此种分析，了解当时《学生报》思想倾向的变化。本章将分析范围限定在 1947—1949 年这三年的理由如下。

第一，这三年是《学生报》的报道内容和其所反映的留日学生思想倾向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学生报》是作为同学总会的机关报创刊的，而同学总会作为全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的统一组织，也是得到当时具有国民政府大使馆职能的驻日代表团的认可的。例如，驻日代表团这一时期也曾要求其他留日学生的团体在进行募集资金等活动时，必须得到同学总会的许可。^② 但是，从 1948

① 何义麟：《战后在日台湾人的处境与认同》，台北，五南出版公司 2015 年版；田远「博士学位論文 戦後直後における中国人留日学生の境遇と選択：1945—1952——主に『中国留日学生報』を通じて」、2014 年 3 月；田远「一九四五年終戦直後の中国人留日学生の境遇と選択——プランゲ文庫で迎える「国家像」」中国文庫株式会社、2017 年。

② 林傑榮「苦学会の成立と同学会との関係」『中国留日学生報』第 34 期、1949 年 8 月 15 日。

年中开始,《学生报》上对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和GHQ进行批评的文章逐渐增多,特别是1949年以后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大幅增加。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生报》基本上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媒体。由此可以认为从创刊的1947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三年,是该报的报道内容以及思想倾向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

第二,避免分析内容的分散。笔者搜集的1947—1957年《学生报》的文章总数超过了2000篇(2164篇)。如果本章对所有文章进行分析则有可能无法对每个时间段进行详细讨论。所以,本章将对1950年以后《学生报》文章的分析留作今后的课题,在此则集中精力分析1947年(第3期)至1949年(第38期)的949篇文章。

二 《中国留日学生报》的报道内容及其变化

首先,笔者对《学生报》创刊之初的三年中所刊登的文章内容进行了分析。图13-1是笔者对949篇文章的属性进行分类的结果。时事新闻报道最多,占全体文章的40.1%;其次是评论文章,占29.9%。作为同学总会的机关报,虽然没有必要以时事新闻为中心,但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当时的编辑部成员希望通过《学生报》向留日学生们传播他们所关心的时事新闻。

本章为了对《学生报》的文章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将所有文章按照表13-1所示分为57个小分类。在统计过程中有的文章在内容上被分别划分为2个或3个以上的小分类,所以内容分类的文章篇数的总和超过了总篇数949篇。不过,把文章内容分为57个小分类,虽然方便对报道文章的内容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但在制作图表进行解说时容易产生不便,所以笔者又将57个小分类根据内容划分为5个中分类,如表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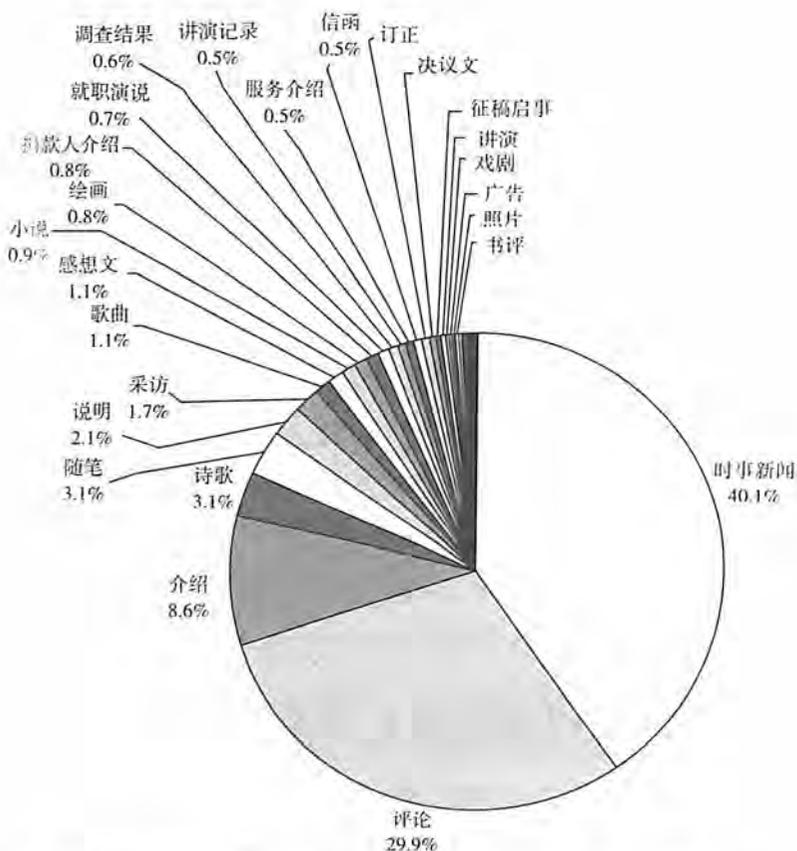


图 13-1 《中国留日学生报》报道文章属性比例 (1947—194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留日学生报》从1947年3月1日发行的第3期到1949年12月1日发行的第38期（其中一部分缺失报纸或页面）全部949篇文章的内容，由笔者整理制作，下同。

表 13-1 《中国留日学生报》文章内容分类

中分类名	小分类名
在日中国华侨、留日学生相关文章	留日学生生活相关、同学总会相关、东京同学会相关、外地同学会相关、台湾学生联盟相关、其他留日学生团体相关、学生救济问题相关、配给相关、留日学生回国相关、华侨总会相关、其他在日华侨团体相关、在日华侨生活相关、在日中国媒体相关、驻日代表团相关、《学生报》相关、东京华侨联合会相关、中日相关团体相关、其他在日中国人团体相关、中华学校相关、华侨学生教育相关、汉语学习相关、在日亚洲国家团体相关、其他在日中国研究团体相关

续表

中分类名	小分类名
中国相关文章	中国政治相关、中国外交相关、中国经济相关、中国教育相关、中国文化相关、中国媒体相关、中国历史相关、中国学生运动相关、中国学生团体相关、中国青年运动相关、中国青年团体相关、中国科学相关、中国内战相关、台湾相关、中日关系相关、国民政府相关、中国社会相关、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相关、其他国家华侨相关
日本相关文章	日本政治相关、日本社会相关、日本教育相关、日本学生团体相关、日本学生运动相关、日本文化相关、日本共产党相关、日本媒体相关
国际问题相关文章	国际情势相关、国际学生运动相关、国际学生团体相关、世界和平运动相关
其他文化、科学、艺术等相关文章	科学相关、艺术相关、文化相关

如图 13-2 所示,对《学生报》的所有文章按照中分类方式分类的结果是,“在日中国华侨、留日学生相关文章”的占比最大(48.1%),之后依次为“中国相关文章”(47.6%)、“其他文化、科学、艺术等相关文章”(16.2%)、“日本相关文章”(9.8%)、“国际问题相关文章”(4.8%)。在日中国华侨、留日学生相关文章中,同学总会相关文章(活动介绍、改选通告、向留日学生会会员提供的服务等)最多,占 15.0%,这明显表明了其同学总会机关报的特征。之后为留日学生生活相关文章 10.7%、《学生报》相关文章 7.8%、东京同学会相关文章 6.1%、外地同学会相关文章 5.0%。这些统计结果充分显示出《学生报》作为同学总会机关报刊登了众多留日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关留日学生的时事新闻的特色。

战后初期,GHQ 制定了政策,不允许从中国大陆和台湾向日本汇款。同时,日本国内实施严格的物资配给制度,留日学生要得到包括食品在内的生活物资非常困难。所以,超过半数以上的留日学生通过同学总会到驻日代表团第四组申请领取“留日学生证”,同时,通过同学总会或华侨总会向 GHQ 或日本政府、驻日代表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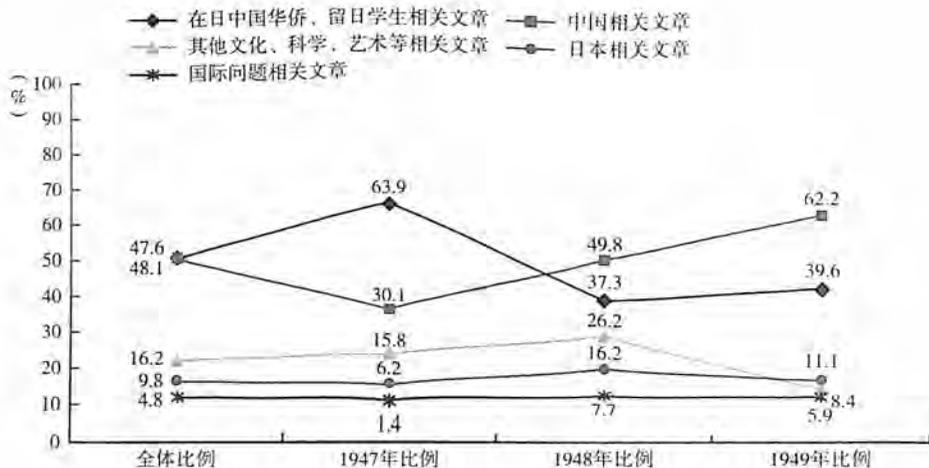


图 13-2 《中国留日学生报》刊载文章内容属性中分类
按照年份统计比例 (1947—1949)

注：由于对于有复数属性的同一文章在各个相关属性中都做了统计，所以总文章篇数不是 949 篇，而是 1019 篇。每年的文章篇数也比实际篇数多，比例之总和高于 100%。

申请发放给战胜国国民的特别配给物资或学生救济金，以维持生活。^① 这些特别配给物资、学生救济金的发放，也是通过同学总会或具有其支部性质（不完全是上下级关系）的东京同学会、外地同学会进行的。^② 在此情况下，《学生报》刊登的文章中不仅包括东京的各种信息，还有许多关于日本各地的同学会的动向，以及与留学生救济相关的文章（3.7%）、配给相关的文章（0.8%）。以上统计结果，说明我们可以通过《学生报》了解当时留日学生的生活情况及其变化的过程，是我们研究战后初期留日学生生活的珍贵资料。

① 「在学証明書未提出者は留学生資格を喪失す」『中国留日学生報』第 7 期、1947 年 7 月 1 日；「総合だより（福利部・総務部）」『中国留日学生報』第 19 期、1948 年 6 月 15 日；王雪萍：《战后初期“中华民国政府”对留日学生政策解析——游离于救济与召回之间的政策之成败》，载《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 9 辑，第 205—244 页。

② 「全国代表委員会」『中国留日学生報』第 22 期、1948 年 9 月 1 日；何义麟：《战后在日台湾人的处境与认同》，第 84 页。

另外，在日华侨相关的信息刊登比例较大也是《学生报》的特征之一。1947—1949年发表的全部文章之中，华侨总会相关文章有42篇（4.4%），在日华侨生活相关文章有29篇（3.1%），其他华侨团体相关文章有15篇（1.6%），东京华侨联合会相关文章有9篇（0.9%），在日中国（华侨及留日学生）媒体相关文章有29篇（3.1%），中华学校相关文章有10篇（1.1%）等，《学生报》广泛地介绍了当时在日华侨的团体及其生活、教育、媒体等情况。比如《学生报》在对华侨总会选举的报道中，对一些候选人的言行进行了批评性的评论，从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在日华侨的一些言行。^①

与“在日中国华侨、留日学生相关文章”的差距不大，《学生报》中刊登的“中国相关文章”的比例也接近半数。相关文章涉及中国政治的104篇（11%）、文化的81篇（8.5%）、社会的49篇（5.2%）、学生运动的42篇（4.4%）、内战的33篇（3.5%）、教育的23篇（2.4%）、经济的15篇（1.6%）等，可以看出《学生报》以大量的篇幅报道或评论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由此可见，《学生报》的编辑们对于祖国中国的最新时事以及内战的形势等政治经济动态也十分关心。与台湾相关的文章有25篇（2.6%）。这是因为台湾出身的留日学生约占同学总会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所以对他们所关心的二二八事件等台湾最新时事的报道，也是对台湾出身会员需求的回应。^②

① 蔡記者「華總選舉風景 名刺をくばる候選人 あきれかへる宣伝ピラ」『中華留日学生報』第5期、1947年5月1日。

② 何义麟：《战后在日台湾人的处境与认同》，第80页；周元宝「会論 献给台湾省諸同学——關於台湾二·二八事件」、「白国防部長談 “中国は台湾を切り離せない” 善良愛国の省民」、「“暴動でなく政治ストだ” 謝南光先生談」、吳修竹「怪々しい断定を許さない 台湾二·二八事件の見方」『中華留日学生報』第4期、1947年3月30日；H記者「台湾工業建設の構想 産業科学技術研究所長林俊生先生熱演」『中華留日学生報』第7期、1947年7月1日；李振華「台湾青年の言語問題」『中華留日学生報』第8期、1947年7月15日；「台湾大学の現状（続）」『中華留日学生報』第15期、1947年12月15日・30日合期；等等。

另一方面，“日本相关文章”所占比例只有9.8%。这是因为日本的相关时事新闻，留日学生们从一般的日本媒体报道中都可以了解到。当然，从这93篇日本相关文章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留日学生所关心的日本时事的内容。

从各年度的文章分类来看，1947年刊登的在日中国华侨、留日学生相关文章占整体的63.9%，其中与同学总会相关文章占20.6%，与留日学生生活相关文章占13.2%，与《学生报》相关文章占9.3%，与外地同学会相关文章占7.6%，与东京同学会相关文章占6.2%。从1947年的《学生报》所刊载文章的分类来看，可以说《学生报》充分体现了作为同学总会机关报的作用，把主要精力放在报道与同学总会、东京同学会、各地同学会、留日学生的生活相关的信息上，是一份名副其实的面向全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的报纸。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报》上刊载的在日中国华侨、留日学生相关文章所占比例在1948年为37.3%，1949年为39.6%，与1947年相比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而与此相比“中国相关文章”的刊载比例，却从1947年的30.1%上升到1948年的49.8%、1949年的62.2%。这种变化与时刻变化着的中国国内形势有关，也与本章在后文所述《学生报》的思想倾向向亲中共之转变有关。

三 《中国留日学生报》的报道与留日学生思想倾向

笔者将1947—1949年《学生报》发表的全部文章分类，将它们的思想倾向分成27类，再对《学生报》思想倾向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如表13-2所示，从总体来看，“事实”报道最多，占比55.0%。其下为“亲中共”19.4%，“中立”7.9%，“批评国民政府”7.3%，“批评日本政府”5.1%，“亲共产主义”4.1%，“亲国民政

府” 2.7%，“批评美国政府” 1.9%，“批评 GHQ” 0.5%，“批评驻日代表团” 0.4%。对于报道总体一半以上为事实报道这一点，可以说，作为同学总会机关报，《学生报》将与留日学生、在日华侨的学习生活相关的内容作为报道的重点是理所应当的。从同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驻日代表团指导下成立的这一角度来看，其机关报《学生报》却刊登了大量亲中共、批评国民政府、批评驻日代表团的 文章这一现象反而更值得探讨。在此期间，包括《学生报》在内的在日本出版的报刊书籍等都要接受 GHQ 的审查（1947—1949 年中只有最后的两期不是收集来自 Prange 文库的 GHQ 审查文本），但《学生报》上还是刊登了批评 GHQ 的 5 篇文章（占 0.5%）。

表 13-2 《中国留日学生报》刊载文章的思想倾向按年度分类篇数及其所占比例

思想倾向	刊载文章 总数 (1019)	总篇数 比例 (%)	1947 年 篇数 (356)	1947 年 比例 (%)	1948 年 篇数 (284)	1948 年 比例 (%)	1949 年 篇数 (379)	1949 年 比例 (%)
事实	522	55.0	262	73.8	154	56.8	106	32.8
亲中共	184	19.4	7	2.0	24	8.9	153	47.4
中立	75	7.9	42	11.8	19	7.0	14	4.3
批评国民政府	69	7.3	11	3.1	26	9.6	32	9.9
批评日本政府	48	5.1	4	1.1	16	5.9	28	8.7
亲共产主义	39	4.1	3	0.8	14	5.2	22	6.8
亲国民政府	26	2.7	21	5.9	5	1.8	0	0.0
批评美国政府	19	1.9	0	0.0	12	4.4	7	2.2
批评 GHQ	5	0.5	1	0.3	1	0.4	3	0.9
批评驻日代表团	4	0.4	0	0.0	1	0.4	3	0.9
批评留日学生的生活态度	4	0.4	0	0.0	0	0.0	4	1.2
批评台湾“独立”	3	0.3	0	0.0	3	1.1	0	0.0
批评日本社会	3	0.3	0	0.0	3	1.1	0	0.0
批评《学生报》	2	0.2	1	0.3	0	0.0	1	0.3
批评日本学者	2	0.2	2	0.6	0	0.0	0	0.0
批评中共	2	0.2	0	0.0	2	0.7	0	0.0
亲日共	2	0.2	0	0.0	0	0.0	2	0.6
批评共产主义	1	0.1	0	0.0	1	0.4	0	0.0

续表

思想倾向	刊载文章 总数 (1019)	总篇数 比例 (%)	1947年 篇数 (356)	1947年 比例 (%)	1948年 篇数 (284)	1948年 比例 (%)	1949年 篇数 (379)	1949年 比例 (%)
批评华侨团体	1	0.1	0	0.0	0	0.0	1	0.3
批评同学会	1	0.1	0	0.0	0	0.0	1	0.3
批评在日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1	0.1	0	0.0	0	0.0	1	0.3
亲美国	1	0.1	0	0.0	1	0.4	0	0.0
批评帝国主义	1	0.1	1	0.3	0	0.0	0	0.0
批评同学总会	1	0.1	1	0.3	0	0.0	0	0.0
批评华侨总会	1	0.1	0	0.0	1	0.4	0	0.0
批评日本媒体的报道	1	0.1	0	0.0	0	0.0	1	0.3
批评苏联政府	1	0.1	0	0.0	1	0.4	0	0.0

图 13-3 是按照《学生报》报道的思想倾向之年度变化制作的。在 1947 年事实报道占到全部文章的 73.8%，1948 年降为 56.8%，1949 年则降为 32.8%，呈逐年递减的趋势。相反，1947 年《学生报》所刊载的亲中共以及亲共产主义的文章分别为 17 篇（2.0%）和 3 篇（0.8%），而亲国民政府的文章有 21 篇，占 5.9%，可以说 1947 年《学生报》的思想倾向更趋亲国民政府。但到了 1948 年，亲中共和亲共产主义的文章分别增至 24 篇（8.9%）和 14 篇（5.2%），反而是亲国民政府的文章降到 5 篇（1.8%）。

进入 1949 年以后，亲中共的文章激增到 153 篇（47.4%），甚至超过了事实报道的 106 篇（32.8%）。可以说，1949 年《学生报》思想倾向的变化最为显著。这与何义麟、田远的研究结果一致。

那么，《学生报》是如何转变其亲国民政府的思想倾向，成为亲中共、亲共产主义的媒体，并且还在其版面上刊登了许多批评国民政府、批评日本政府、批评 GHQ 的文章，转变为倾向共产主义的媒体的？笔者将对其报道内容和其变化的背景加以探讨。

亲共产主义的文章，早在《学生报》创刊不久的 1947 年 3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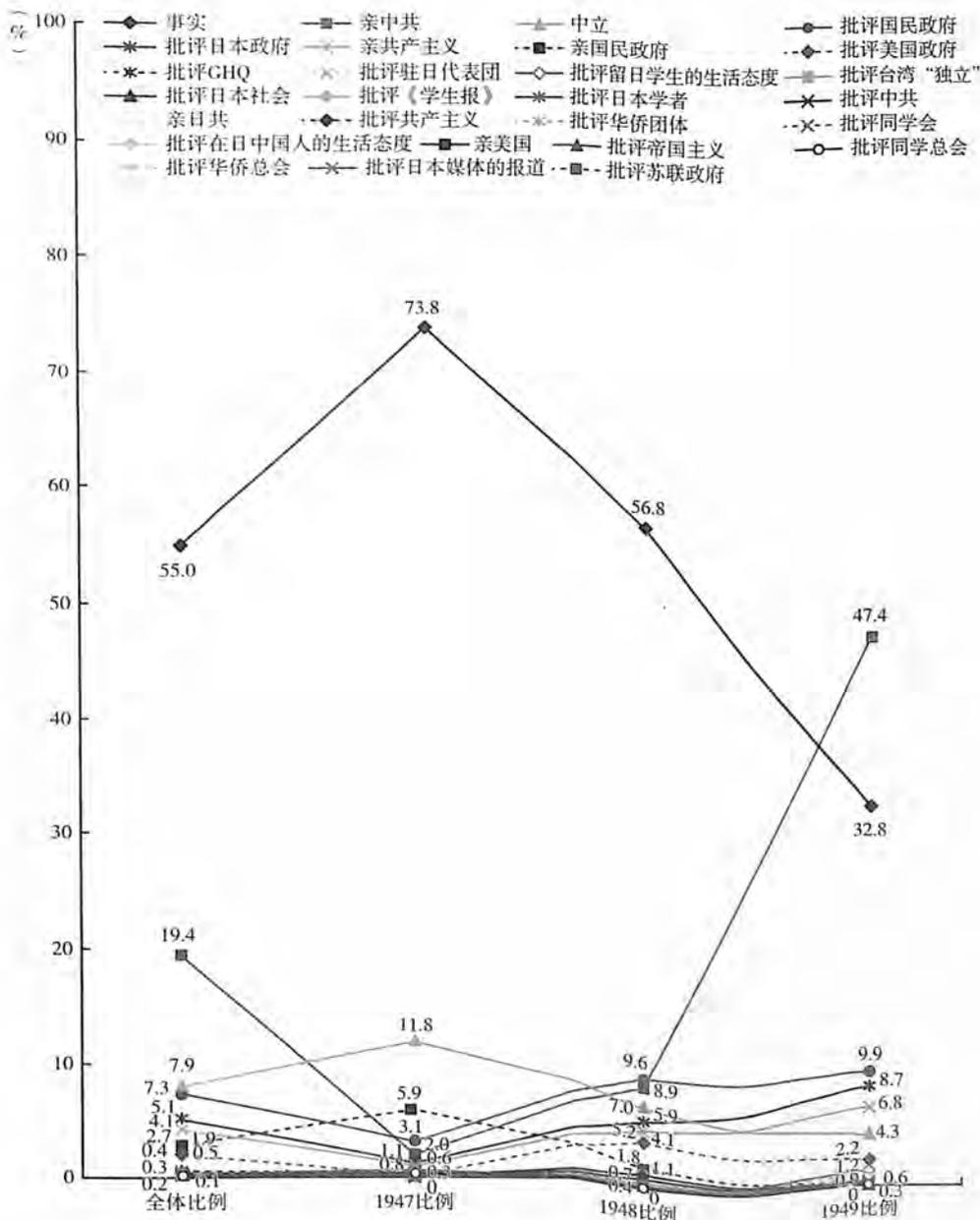


图 13-3 《中国留日学生报》刊载文章思想倾向年度比例 (1947—1949)

30日发行的第4期和5月15日发行的第6期上就已经刊登了3篇。这可以说是其较早对共产主义进行介绍的文章,内容也基本上是介

绍日本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哲学等。^①而亲中共的文章是从第7期（1947年7月1日发行）才首次出现。从那以后一直到第19期（日语版1948年6月15日发行、汉语版1948年6月1日发行），几乎每期都有1—3篇关于中国内战、中国历史等内容的文章中表现出亲中共的思想倾向。在1948年7月1日发行的第20期（“民族复兴纪念号”）以后，《学生报》上刊载的亲中共的文章数量急剧增加。

但是，何义麟和田远的研究都将1948年5月4日发行的第18期“五四纪念特辑号”作为《学生报》思想倾向转变的转折点。何义麟认为，“这一期名为‘五四纪念特辑号’，页数倍增为16页，发行人王毓声，编辑人康春祥。这期特辑中，日本左翼学者盐胁幸四郎《五四运动的历史基础》专文占了12页，其余4页中文版也是谈五四运动。盐胁之专文，将五四的发生定位为中国革命史的源头，然后分别介绍五四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革命有何影响。中文版文稿之论旨，也是将五四学生运动连接到当时的反帝、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这是学生报相当特殊的一期，整体明显在呼应中共之宣传论述，这显示学生会已开始转变”。^②

田远也论述道：“留日学生的政治态度从1948年《中国留日学生报》的舆论动向中可见一端。《中国留日学生报》的更名以及其中刊登的论及留日学生的政治态度等的文章都是其表现，而最为明显的即为五四运动特辑号。留日学生的基本政治态度从以前的支持国民政府，转变为对国民政府的有限批判，再到理论上与中共共鸣，进而到彻底转向支持中共。从《中华（中国）留日学生报》没有任何说明即改名为《中国留日学生报》这一事实，就足以显示其具有象征性的政治意义。1948年的五四特辑号是留日学生政

^① 郑孝舜「历史唯物论之轮廓（一）」、绿衣「最近日本的劳働運動」『中華民國留日学生旬報』第4期、1947年3月30日；郑孝舜「历史的唯物论之轮廓（二）」『中華留日学生報』第6期、1947年5月15日。

^② 何义麟：《战后在日台湾人的处境与认同》，第94页。

治态度转变的起点。”^①

正如何义麟所述，第18期刊登的盐胁幸四郎的文章，有明显的亲中共之倾向，因此笔者在做思想倾向分类时将其列入“亲中共”。尽管如此，如果仔细阅读其文章内容，也可以了解到这并非一篇完全描述中共的文章。在全部12页的文章中，为了让读者理解五四运动，作者用了半数以上（7.5页）的篇幅解说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革命史。在谈到有关五四运动时，作者以同等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在谈到掌控（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时，又明确阐明了从孙中山逝世之后至西安事变前的“中国革命”之领导人为蒋介石，西安事变之后事实上的中国革命力量的中心才转到中共方面。从这些方面可以说盐胁对中共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以盐胁的这一篇文章作为第18期的《学生报》已经变成一份亲中共、亲共产主义的报纸的主要根据，笔者认为有对盐胁文章过度解读的成分。

关于上述两位学者所指出的报纸版面（在所有收集到的《学生报》中第18期的页数最多，而且版面的排版方式与其他期完全不同）和内容的变化，笔者认为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变化。其一是编辑负责人的更替。《学生报》第11期至第16期（第17期未能找到）的发行人是范琦，主编是李子聪。而第18期的发行人是同学总会的新主席王毓声，主编是康春祥。王毓声也是第19期的发行人，但该期的主编变成了李泰然、林连德、简镜山三人。另外，第19期的编后记中还写道：“我们担任编辑工作以来，本期已经是第二期了。但尚不能按照我们本身的想法来进行编辑，特此致歉。我们的方针是，就算在报纸的形式上后退一些，也希望能在编辑意图和主张等方面贯彻我们编辑的思想。作为学生的报纸，特

^① 田遠『一九四五年終戦直後の中国人留日学生の境遇と選択——プランゲ文庫で辿る「国家像」』、173頁。

别是本报作为留学生的报纸，从这一点出发就已经规定了《学生报》的性质。学生报纸没有新闻性，比起普通的报纸，《学生报》必须具有批判性。本期努力在第4页和第5页进行了新的尝试，并在第3页上努力刊登了一些比较愉快的话题。效果如何，敬请读者赐教。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于下一期的编辑方针给予建议。”向读者表达了编辑人员在编辑学生报时的意图与难处。从第19期的编后记来看，第18期的编辑确实出现了与之前不同的特点，这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使得第19期在编辑工作上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但是，他们又强调第18期与第19期编辑人员的连续性，如何解释这一点还需今后进一步考证。

对比这两期报纸，第18期刊登的文章只有6篇，而第19期激增到37篇。从思想倾向分类进行比较来看，相对于第18期中事实报道1篇（16.7%）、亲中共1篇（16.7%）、中立4篇（66.7%），第19期刊载的文章中事实报道为26篇（70.3%），亲中共2篇（5.4%）、中立2篇（5.4%）、批评日本社会2篇（5.4%），批评国民政府、批评日本政府、亲共产主义、亲国民政府、批评共产主义的各1篇（2.7%）。由第19期的文章构成来看，其编辑方针是兼顾各类文章，努力保持让各方面满意的维持平衡的程度。在编后记中所表示的编辑方针的变更，也不排除是对第18期所刊登的内容受到批评以后进行解释的可能。

把第18期作为《学生报》思想倾向转变标志的判断略显草率的第二个理由，是在第19期的汉语版上刊登了胡适的文章《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这篇文章是明确站在批判共产主义的立场进行论述的，并将苏联作为侵略势力进行批判。在第19期中使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名望极高的胡适的文章批判共产主义，笔者认为这是借胡适的权威，做出《学生报》并不是一份一边倒偏向共产主义报纸的表态。在第19期之后的第22期和第24期上也刊登了2篇批评中共的文章，这也是第18期并不是《学生报》完全转向标志的有力反证。

其三是第18期的印刷形式与之前不同,笔者认为有可能是因为更换了印刷厂,并没有政治意图。第3期至第7期《学生报》上标记的印刷场所是“东京都小石川区小石川町一 中华学艺社”,第8期至第16期《学生报》上并没有记载印刷场所。但是,在第18期上印刷场所则标记为“みやこ(都)新闻社 中华学艺社”,在“中华学艺社”之前追加了一个“みやこ(都)新闻社”。虽然笔者不能确定,但是第18期的印刷工作有可能是因为中华学艺社的印刷厂出现问题,所以主要由みやこ(都)新闻社负责,报纸版面的变化有可能是由于印刷机器的种类不同而不得不更改。在第18期出版并受到一些批评后,第19期以后的印刷场所又更换为“中华日报社 中华学艺社”,所以第19期以后的报纸版面形式与第16期以前的和第18期的都不同。

至于《学生报》名称的变更,笔者认为也不能作为第18期就是其思想倾向转折点的根据。第18期开始使用的报纸名称不是从第5期至第16期一直使用的《中华留日学生报》,而是用《中国留日学生报》的名称刊发的。但是,因为第17期一直未被发现,那么报纸名称的变更有可能是从第17期就开始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在第17期更名时有可能刊登了更名的原因,所以特别指出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报纸的名称就被变更,表述有失慎重。另外,如果认为同学总会是因为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态度增强而更换《学生报》的名称,那同学总会应该也同时更改其冠有中华民国之国名的会名。然而,《学生报》的发行机关名称直到第34期一直使用“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学生报》发行机关一栏的名称变更为“中国留日同学总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开国大典之日已经公开的1949年9月1日发行的第35期。

如上所述,亲中共的文章篇数激增是从1948年7月1日发行的第20期开始的。1947年《学生报》上刊登的亲国民政府的文章有21篇,但到了1948年8月1日发行第21期以后亲国民

政府的文章完全消失了。而这一时期刚好和同学总会开始接受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领导的时间接近。因此，笔者下面以日共对同学总会的领导为中心，通过对相关人员的采访和他们的回忆录，对《学生报》思想倾向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探讨。

围绕日共和同学总会的关系，1948年日共中就有领导在日华侨和留日学生的组织的传闻一直存在，但关于这个组织一直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的情况。不过，作为日共党员当时也负责过对同学总会指导工作的中国对日工作人员郭承敏的回忆录《一个台湾人的奇特人生》一书，于2014年8月在日本出版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该书是作者直接用日语写成的，书中明确指出了当时日共领导过同学总会和华侨总会的事实。他在书中明确指出，日共领导同学总会工作的部门，是由中共和日共达成协议，于1948年6月秘密组织成立的。^①此书出版之后，关于日共领导同学总会、华侨总会之事得以解密，所以一些当时参与此事的中共与日共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相继书写回忆录，并接受采访。^②其中在笔者对同学总会原主席、日共党员郭平坦进行的采访中，他直接承认了郭承敏回忆录中所写的关于同学总会与日共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事实。^③

另外，以同学总会原主席郭平坦为中心编辑的《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二十年（1946—1966）》一书，对于日共华侨留学生支部的诞生及之后的活动做了概述：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时任东京华侨联合会副会长的

① 郭承敏『ある台湾人の数奇な生涯』明文書房、2014年。

② 对同学总会原主席郭平坦的采访，2015年6月，北京。

③ 《日本共产党华侨留学生支部的诞生》、杨幼瑛：《我所知道的日本共产党华侨支部的诞生》，载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20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20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年版，第44—45、59—62页；对同学总会原主席郭平坦的采访，2015年6月，北京。

杨春松（台湾桃园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三次被捕入狱）从东京出发，经过朝鲜半岛进入东北，见到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之后到达当时由我八路军控制的张家口，见到了中国共产党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德。杨春松向组织请示：在日本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有数万人，今后应该怎么办？此时得到延安的回复，可以成立共产党组织。但日本的实情，日本共产党最了解。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因此你们应服从日本共产党的领导。1946年4月、5月，杨春松原路返回东京，他当时作为日共党员向日共中央汇报此行。1947年6月，中共中央与日共中央达成协议，日本共产党华侨支部正式成立，并直属于日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统制委员会）。随着国内解放战争的发展，日本共产党华侨支部亦发展很快，由开始的10多人，一年后增加到几十人，因此分别成立同学总会的留学生支部和其他地区的支部。分别领导这些支部的，是由日共派出的特派员。

同学总会的共产党支部从1947年至1955年底解散共9年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在1951年至1952年的困难时期不被压垮，坚定地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爱国团结。其次是从组织上保证了同学总会拥护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正确路线。据统计，共9年的13名同学总会主席均是共产党员，大部分副主席亦是共产党员。日本华侨留学生支部开始由日共中央领导，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共中央被美国占领军镇压。之后，华侨留学生支部直接由中共中央来领导。随着形势的发展，1955年底中共中央指示，日本共产党华侨留学生支部解散。^①

^① 《日本共产党华侨留学生支部的诞生》，载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20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20年》，第44—45页。

另外，根据郭承敏的回忆，1947年4月他进入一高（现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时候，一高里已经有日共的支部。^①郭在入学一年后的1948年4月被人劝说参加日共，在经过认真考虑之后，他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式加入一高的日共支部。当时，日共一高支部成员共有二十多人，比郭承敏还早入党的中国人有崔士彦和陈文贵两人。^②

因为当时同学总会的成员多为一高、东京大学的在校生及毕业生，^③所以《学生报》可能从创刊初期就已经受到日共成员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有日共的影响，1947年3月30日刊发的《学生报》第4期中就已经刊登了2篇亲共文章。

关于日共华侨、留学生支部开始活动的时间，郭承敏回忆为1948年6月。^④其过程如下文所引。他还指出除东京外，1948年5月1日在京都也成立了直属日共关西统制委员会的中国人秘密支部。

（1948年）6月大约在梅雨季节结束的时候，崔士彦告诉我因为有重要的会议，让我到小田急线的新宿车站的站台

① 据郭承敏的回忆，对这个组织的称呼有“バルタイ”“细胞”等。本章为了避免混乱，除直接引用原文的情况以外，全部使用日共“支部”这一说法。

② 郭承敏『ある台湾人の数奇な生涯』、88—98頁。

③ 如崔士彦曾长期负责同学总会的工作和《学生报》的编辑工作。

④ 杨幼瑛在文章中介绍日共华侨留学生支部的成立时间为1947年6月（《我所知道的日本共产党华侨支部的诞生》，载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20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20年》，第59—62页）。但是，因为杨幼瑛在1947年还未出生，笔者认为不能排除她为设立日共华侨留学生支部做了重大贡献的父亲杨春松或其他家人那里听来的信息有错误的可能性。考虑到杨幼瑛以外的人写的回忆录的可信度，以及《学生报》从1947年3月到1948年5月共刊登了25篇亲国民政府的文章，而同一时期亲中共的文章只有12篇，笔者认为1948年6月日共华侨留学生支部成立的说法可信度更高。所以，本章基于1948年6月支部成立的说法展开论述。如果将来中共或日共公开新史料，关于支部成立时间这一史实的认定有可能出现变化，笔者希望继续寻找相关史料加以证实。

与他会合。吕永和等几个人在小崔的带领下到了成城学园前的安静的高级住宅区的潇洒的洋房。聚集在一起的有十二三人吧。因为是五十七年前的事了，现在能想起来的参加人员有崔士彦、陈文贵、吕永和、林杰荣、赖奎娇、黄永国、范琦、于长久，好像还有一两个其他人吧。……首先由老前辈杨春松给大家介绍了岩本严日共统制委员会委员。然后他说：“今天来的都是已经加入日本共产党，或者今天要写入党申请书的同志们。现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良好，我们中国党员也要在新的局面下面临新的任务。由中共中央和日共中央协商决定，在日本的中国党员，今后要在日共中央统制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华侨、留学生开展启蒙、组织工作，这要和日本的民主势力联合起来行动。”接着岩本同志追加说明：“你们的党籍从现在的所属部门转到这个新的组织。这件事由中央通知给各个支部。这个组织是秘密组织，但是其活动要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

如此，日共华侨、留学生支部虽然成立了，但因为是秘密组织，日共党员也不能在同学总会会员中宣布此事。据郭承敏回忆，成立之初只有十多个人的这个组织，在一年多之后包括关西小组在内已经扩大到五十多人的规模。日共华侨、留学生支部的活动也在1948年6月以后随着党员及组织的增加而逐渐活跃起来。^①

同学总会内建立了日共支部之后，其影响在《学生报》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是在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第24期（11月、12月合期）。该期上刊登的文章构成，为事实报道15篇（39.5%）、亲中共3篇（21.1%）、批评国民政府7篇（18.4%）、亲共产主义6篇（15.8%）、批评日本政府2篇（5.3%）、批评美国政府2篇

^① 郭承敏『ある台湾人の数奇な生涯』、99—106頁。

(5.3%)、批评驻日代表团 1 篇 (2.6%)、批评中共 1 篇^① (2.6%)、批评华侨总会 1 篇 (2.6%)。^② 第 24 期的《学生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亲共倾向与该期发行之前 (1948 年 11 月) 同学总会和东京同学会的代表委员改选, 由新执行委员负责编辑有关。在 11 月选出的委员之中, 日共相关人员有林连德 (就任时不是党员, 1950 年加入日共)、副主席兼东京同学会主席林杰荣、同学总会兼东京同学会文化部委员郭承敏、崔士彦。《学生报》相关人员中, 社长林连德、主编崔士彦、编辑吕永和, 同学总会中主管《学生报》的部门为同学总会文化部, 而该部的两名委员均为日共党员, 主编又由 1947 年以前就是日共党员的崔士彦担任。^③ 从此人事安排就可以看出日共对《学生报》的影响之大。

第 24 期《学生报》所刊登的文章内容之变化也引起了 GHQ 的注意, 并导致相关人员被 CIE (GHQ 民间情报教育局) 传唤。对于这一事件, 郭承敏在回忆录中做了叙述:

在 1948 年秋天发生了与《学生报》相关的事件。当时出版的《学生报》确实曾提到在当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参选的华莱士 (Henry Agard Wallace), 并将其表现为亲中国派, 更在那篇文章中批判“美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本家”, 这样的用词被他们称为违反《日本新闻报道规则》(Press Code

① 这篇批评中共的文章是刊登在该期汉语版的《一篇关于共区生活的报道》, 是从中国国内出版的《观察》杂志转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还标注了“社告: 11 月期本刊因为经济困难未能发行, 本次 11 月、12 月两期合并发行。发行时间延迟, 非常抱歉”, 并且在第 24 期汉语版 (全 3 页) 上并没有标注发行日期。综合这些情况, 笔者认为这篇文章有可能是旧编辑人员决定在 11 月号上刊登的, 虽然在 12 月编辑人员发生了变动, 但对于已经决定刊登的文章不得不继续刊登。

② 第 24 期上共计刊登了 38 篇文章, 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复数思想倾向之时, 笔者同时进行了统计, 所以百分比之和不是 100%, 而是 113.2%。

③ 「同学總會東京同学会委員改選 總會主席林連德 副主席林傑榮、高銘智」〔中国留日学生報〕第 24 期 (11·12 月合期)、1948 年 12 月 1 日。

for Japan)。作为负责人的同学(总)会主席林连德与学生报主编崔士彦被 CIE 情报科新闻出版班班长英博登少校(Daniel Imboden)传唤。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我是(郭承敏),但是我不在传唤名单上。少校通过日裔第二代的中尉翻译批评说“这是对同盟国的虚假报道或者说是恶意批判”。林连德反驳说,“我们是同盟国成员的中国人,所以不受《日本新闻报道规则》的制约”,“是不是美帝国主义,这是文章作者的意见,应该保证言论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恶名昭著的英博登少校进一步要求“那你们就写下‘中国留日学生报因为违反《日本新闻报道规则》而接受了警告’一文”。林连德当时还提出要加上一句“但是我们不接受”,但小崔则说“那就这样吧”,进行了妥协,没有把林连德的追加案写上去。当时小崔已经是共产党员了,而林连德入党是在 1950 年以后。小崔当时说:“真让我吃惊啊。老林一身正气,一点都不退缩。”^①

尽管受到 GHQ 的传唤,《学生报》也没有停止刊登对美国政府、对 GHQ 进行批评的文章。1949 年《学生报》文章的思想倾向分类构成,变为以亲中共的文章为主,达到 47.4%,其后为事实报道 32.8%、批评国民政府 9.9%、批评日本政府 8.7%、亲共产主义 6.8%、中立 4.3%、批评美国政府 2.2%、批评留日学生的生活态度 1.2%、批评 GHQ 0.9%、批评驻日代表团 0.9%、亲日共 0.6%、批评《学生报》0.3%、批评华侨团体 0.3%、批评同学会 0.3%、批评在日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0.3%、批评日本媒体的报道 0.3%。从此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1949 年《学生报》刊载的文章与

^① 郭承敏「ある台湾人の数奇な生涯」、111—112 頁。被 CIE 认为有问题的文章为「國際学連の旗の下に 邁進せよ!世界の恒久平和へ」『中国留日学生報』第 24 期(11·12 月合期),1948 年 12 月 1 日。

1947年的文章构成变化之巨大。但即使如此，《学生报》还是持续刊登了许多事实报道和中立报道的文章。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学生报》既要坚持其作为同学总会的机关报的性质，也要坚持为会员们提供与留日学生的学习、生活、文化等相关的各方面信息。如图13-2所示，对1949年《学生报》的所有文章进行分类分析，“中国相关文章”虽然最多，但“在日中国华侨、留日学生相关文章”占到39.6%，“其他文化、科学、技术等相关文章”占到8.4%，这也是上述论点的佐证。

四 小结

本章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对《学生报》上刊登的文章按照属性、思想倾向进行分类，通过刊登文章类型的变化展现该报从亲国民政府向亲中共的转变过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转变过程并不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推进的，很明显其中伴随诸多困难。

《学生报》1947年创刊后曾两度更名。创刊时名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旬报》，发行机关用的是“留日同学总会”，而不是其“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的正式名称。之后同学总会各地分会的名称因为没有统一的称呼，在留日学生中也遭到质疑，同学总会执行部最终决定要求各地的同学会统一使用冠以中华民国国名的同学会名称。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5月1日发行的第5期《学生报》名称改为《中华留日学生报》，发行机关则明确使用同学总会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这应该是在强调其作为同学总会机关报的性质，使报纸的发行更为正规。^①

与此相对，后来在1948年5月4日第18期的改变报纸名称之

^① 「声 名称の統一（東京・委員）」『中華留日学生報』第9期、1947年8月15日；「同学会だより」『中華留日学生報』第10期、1947年9月1日。

事和同年6月第19期开始的改变纪年写法的做法，则可以认为是因为留日学生和华侨在提到“中华”“中华民国”这些名称时，一般都会联想到国民党政权，所以这应该是为了削弱《学生报》亲国民政府的立场，更多展现其亲共或中立的政治立场的一种努力。而使用民国纪年是国民政府的一贯立场，使用公元纪年则是中共的方式。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虽然1948年春天该报只是更换了名称和纪年方法，且这些变化在目前收集到的报纸中并没有说明原因，但也可以说明此时期同学总的思想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同学总会直至1949年8月一直使用冠有中华民国国名的“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这一名称而未作更改，原因应该是战后日本物资极度匮乏，中国留日学生、在日华侨还需要在实行配给制度的日本，通过具有国民政府大使馆性质的驻日代表团申请配给生活物资；为了维持留日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和同学总的活动，也必须与日本政府和GHQ保持良好关系。^①另外，当时同学总的成员、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国留日学生，思想倾向并不是都转变为亲中共、亲共产主义。根据1948年10—12月同学总会对日本全国的同学总会会员中的留日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当时的留日学生中支持国民党的为12名，支持共产党的为27名，支持民主同盟的为37名，中立的为87名。由此可以证明，1948年底明确表示支持中共的留日学生在会员中还只占少数。^②

另外，《学生报》作为同学总的机关报，刊登了许多同学总会在日本各地的会员的投稿和关于各地留日学生生活的文章。同

① 王雪萍「戦後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の生活難と政治姿勢をめぐる葛藤——救済金問題を事例に」大里浩秋編『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ゲ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83—119頁。

② 「留日学生のデザイン——一九四八年末総合調査統計〔生活調査・世論調査〕」『中国留日学生報』第25期（该期上期号错误地标注为第26期，但在下一期的社告栏中进行了订正，所以在本文中将其标为第25期）、1949年2月1日。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劉傑・川島真編『一九四五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31—51頁。

时，同学总会和日本各地同学会、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也得以持续刊载。从这些文章中也可以了解同学总会、华侨团体与国民政府和中共的关系。所以，《学生报》还可以作为研究从战后初期至 20 世纪 50 年代留日学生、在日华侨的生活及其思想倾向的变化，甚至留日学生、华侨与中国政府、日本政府、GHQ、日共的关系，以及留日学生史、华侨史等方面的史料。

兹将各章分工介绍如下：

- 前 言 孙安石
第一章 大里浩秋
第二章 郭梦垚
第三章 孙安石
第四章 胡颖
第五章 栾殿武
第六章 川岛真
第七章 李晓东
第八章 周一川
第九章 中村みどり
第十章 潘吉玲
第十一章 徐志民
第十二章 见城悌治
第十三章 荒川雪
参考文献 徐志民、郭梦垚

后 记 徐志民

作者简介附后。

各位作者和译者虽然认真和努力，也曾反复修改和校对，但由于我们能力有限、水平不足，错漏恐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人批评指正。这既是对我们的关爱，也是我们学术成长道路上必要的鞭策与鼓励。最后，我们特别感谢书稿的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推荐支持，特别感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出版资助，无以为报，唯有努力！

徐志民

2022年2月22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团体与日常：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 / 徐志民等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8

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201 - 9434 - 1

I. ①团… II. ①徐… III. ①留学生 - 社会生活 - 历史 - 日本 - 近代 IV. ①G64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57829 号

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团体与日常：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

著 者 / 徐志民 [韩]孙安石 [日]大里浩秋 等

出 版 人 / 王利民

责任编辑 / 邵璐璐

责任印制 / 王京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33 千字

版 次 / 2022 年 8 月第 1 版 202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9434 - 1

定 价 / 128.00 元

读者服务电话：40089188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